

华南与东南亚 相关民族

● 范宏贵 著

民族出版社

广西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范宏贵教授友人及学子

资助出版

L380.7

HUANAN YU
DONGNANYA
XIANGGUAN MINZU

华南与东南亚 相关民族



● 范宏贵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范宏贵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7

ISBN 7-105-06387-4

I . 华... II . 范... III . 民族 - 研究 - 华南地区、
东南亚 - 文集 IV . K28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19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75 字数: 41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引 言

人们爱把人生的晚年比喻为夕阳，由此又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说。我想，黄昏有好几种：晴天的黄昏，阴天的黄昏，又阴又雨的黄昏。我庆幸这一生赶上了令人敬仰的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我的黄昏是大晴天，我的学术成果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我得感谢父母生我逢时，如果我早生几年，改革开放时，已到退休年龄，就会赶不上这美好的时光。

与朋友聊天，议论人生，是先苦后甜好呢，还是先甜后苦好？大家都说是前者好，我也有同感。我的这一生属前者。解放前，是我的少年儿童时代，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1949年昆明解放前，一些进步书刊已在学生中半公开流传。1947—1948年，我从兄姐手上转来丁玲著《红旗呼啦啦飘》，赵树理著《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还有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幼稚的心灵。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拥护。16岁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在大学读书时，得到党的信任，积极参加学生会和青年团的社会工作。不料，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被先戴上右派帽子批斗，次年宣布对右派分子处理时说：宽大处理，不算右派。但范某不是没有错误。虽然躲过这一劫难，

但属极右分子，低人不是一等，而是两三等。从此，我谨小慎微。看书是惟一的乐趣。反右斗争中，批判“一本书主义”也很厉害，说用个人名义发表文章或著书立说，是想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反右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绝大多数文章和书的作者是用某某写作组或某个集体用笔名、代号署名。我这个人爱动笔写东西，不知哪里来的豹子胆，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959年12期的《史学月刊》，因为我处事为人不露锋芒，幸运没有挨冲击。这是我走入学术领域的起点，到今年刚好45年。

1956年，我开始研究壮族，而壮族地区与越南毗邻，越南也有壮族，不过称为岱族、侬族等等。壮族历史与越南历史有些瓜葛，很想联系在一起研究。可惜那个时代不允许个人发表涉及国外的书文，实际上也没有条件去研究。于是我开始翻译一些越南的文章和书，从而锻炼了我的文笔，为今后的独立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婚后，我有两个孩子。那时，我的月工资是60.5元，而公社书记才领27元。一个月的伙食费是8元，可以说是不菲的了。但送一个小孩入幼儿园每月24元，入不敷出。只好给晚报写豆腐块的文章，每月赚得十多元，聊补支出的空缺。这些文稿大多是用笔名发表的，也给我练了笔。

使我难忘的是，反右派斗争后，有少数胆大的右派分子还给报刊写文章，被人检举出来。后来，报刊编辑部在发表文章之前，都要发函到作者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调查作者政治上是否可靠。1962年，我给《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写了一篇长文，已打印了清样，可是终因反右时留下的痛伤，没有能发表，给我很大的打击。

我的以上叙说有两个目的。第一，年轻人看了上述文字，以为我是在讲天方夜谭，然而这是真实的事情。我珍惜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也希望年轻的朋友珍惜它，好好利用这美好的时光。第二，回首往事，鞭策自己，在有限的余生中做出一

点有益人民、有益社会的事。

这个集子是我从已发表过的近 120 篇文章(不包括豆腐块文章)中选出的,占已发表文章的约三分之一,有不妥处,请专家、读者指正。最后,我在此感谢广西民族学院校方,二级学院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及外语学院,还要感谢周建新、张有隽、黄兴球、古小松、黄秀莲、李娜、农祥亮、潘岳以及其他朋友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范宏贵 2004 年 3 月 18 日于广西南宁相思湖畔

目 录

中国南方民族研究

20世纪的壮学研究	(1)
壮族族称的缘起和演变	(69)
谈谈“坐家”和“不落夫家”	(78)
壮族封建制社会的形成	(82)
唐宋时期壮族地区的奴婢问题	(92)
熠熠生辉的壮族文化再创辉煌	(103)
依智高起兵反宋不是历史上的一股逆流 ——与陈维刚等同志商榷	(115)
浅谈壮族历史上舞蹈的发展及其概况	(120)
在大瑶山进行微型研究的体会	(127)
十万大山调查琐记	(137)
鼻饮有当代民族学实证	(145)
谈谈伶人的存在与消失	(150)
瑶族婚姻与家庭	(159)
京族婚姻与家庭	(173)

东南亚研究

漫步泰国话宗教与华人	(182)
与泰国华人的认同感	(187)
老挝华侨华人剪影	(193)
壮族与泰国的泰族是孪生兄弟	(202)
泰族起源与迁徙再探	(209)
壮、泰、老、傣族的同源与分化论	(219)
云南的哀牢与老挝的哀牢辨析	(234)
哀牢乃克伦人的先民	(250)
从云南迁入越南的民族	(258)
从贵州迁徙到越南的民族	(268)
瑶族从中国迁入越南浅谈	(278)
中国彝族进入越南一分为二	(289)
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	(302)
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	(319)
革新后的越南社会主义	(332)
略谈胡志明思想	(346)
越南的革新进入新时期	(355)
越南的农业革新	(367)
越南革新时期的农业土地政策及其作用	(378)
越共对社会主义和剥削问题的新认识	(386)
越南正视民族问题	(395)
越南的毒品及禁毒政策与措施	(404)
1927年以前越南革命者在广州的活动	(418)
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工农政权	(422)
越南文字的替换与发展	(430)
现代越语中的古汉语借用	(442)

中越关系史上一页

——越南三种作物向中国传播记 (449)

附录

附录一 1999 年越南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各省市、各民族人口统计表 (452)

附录二 2000 年 4 月泰国的人口调查 (458)

附录三 2002 年老挝民族和人口资料 (460)

20世纪的壮学研究^{*}

我国壮族人口仅次于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排列第二位，也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 16 178 811 人（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散居的壮族分布面较广，东从广东连南壮族瑶族自治县，西至云南省丽江县，北由陕西的柞水县，南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1991 年广西壮学会成立，首任会长张声震。1993 年，云南省也成立了壮学会，首任会长罗运通。研究壮族的学问称为壮学，其实在壮学会成立之前，已有人研究壮族了，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经历过从个人研究到有组织的集体研究，由外国人肇始后中国人尤其是壮族学者为主体的研究，以研究语言入手到全方位的立体研究。

一、初始阶段（1897—1923 年）—— 发端于外国人研究时期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对壮族及其先民的文献记载较丰富。可对壮族的研究却始于外国人，是从研究国外的民族涉及壮族，又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

16 世纪末，英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向海外扩张。法国紧跟其后。虽然英、法两国插足亚洲比荷兰、葡萄牙、西班牙

* 原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 2002 年卷》，民族出版社 2003 年出版，与韩德明合作。

晚，但不甘示弱。英、法两国先后在我国的邻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攫取了特权，并开始渗透到我国边疆。殖民者到了亚洲国家，要了解、研究、掌握这些国家的人文、社会和历史情况，便于侵略和统治，也必然要与当地的民族接触，要传教，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法律、政策等等，就得用当地的群众语言。

由于西方学者到东南亚后最先接触到的是泰人，先入为主，以后凡与泰国泰语相同或相近的民族一律称为泰人或泰族，壮族、布依族等民族也列入其中。188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了阿·罗·柯奎翁（A.R. Colquhoun）写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一书。伦敦大学教授特·德·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为该书写了一篇导言，题目叫《掸族发源地》（*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把壮族与泰族混为一谈，并臆断说，泰族起源于我国的四川、陕西省山谷间……迁到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最后才进入中印半岛。法国人皮·勒·邦德里（Pierre Lefere Pontalis，也译为兰番佛巴德里）于1897年发表了《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invasion Thaïe Indochine*）（载荷兰《通报》1897年第1卷第8期和1919年第2卷第10期），认为：“（越南）高平之土族，黑河之布傣族，澜沧江之老挝族实皆傣族之支派耳……广西区域之傣族与在（越南）谅山区、高平区之傣族，其中70%皆作一种民族名称解。”^①

英国殖民者占领缅甸以后，企图修建一条从缅甸到中国与长江相连接的铁路，于是派H·R·戴维斯（H. R. Davies）到云南考察筑路的线路。1894—1900年，他先后4次到云南踏勘，或徒步或骑马，翻山越岭，历尽艰险，耳闻目睹了各地的民情。后来他以日记体写了一本《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1911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该书主要讲述了滇西、滇南、四川、西藏、越南北部的民情。因著者亲临其境，算是第一手资料，故这本书有较大影响，有不少人引用其著作，且在台湾出版过英文版，日本又译成日文出版。戴维斯在书中

^① 转引自陆翔译：《国闻译证》，第1册，开明书店。

写道：

“这个极其文明而且分布广泛的民族自称为泰，掸是他们的缅语称呼，中国则称他们为百夷。暹罗是目前这个民族仅存的最大王国……但是无论暹罗王国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小掸国都未包括其民族的所有成员……在云南南部和北部湾边界，他们大多居住在低谷，甚至有一小部分分布在云南北部靠近扬子江上游的地区。我发现至少有一个掸族村寨就在木里的藏族地区。在贵州被称为仲家。我毫不怀疑在广西和广东这些南方省份也有大量分布。事实上，云南人说广东人与掸人同属一族，而且可注意到掸人与中国南方人的面容是相似的。”^① 戴维斯前面所说，把贵州省的仲家（即今布依族）归入泰掸族中，认为广西、广东有泰掸人，显然指的是壮族，不过当时还没有民族识别。他不是人类学家，也不是民族学家或历史学家，只凭他短暂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就发现了布依族、壮族与泰掸族的关系，可见他知识渊博，有高度的洞察力。

美国人杜德（W.C.Dodd）牧师在泰国北部的清莱传教三十多年，精通泰语和老挝语。1910年，他到我国云南、广西的傣族、壮族地区步行、骑马、乘船进行民族田野调查，1923年在美国依阿华出版了一本书叫《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 Iowa, USA,*），他认为当时泰族有约2000万人，分布在暹罗、越南、缅甸及中国西南、海南岛。他援引菲立民传教士的话说：

“为泰族盘踞地之中国西南部领土，若广西、贵州、海南岛及广东一部分，又云南东部与西部，均有多量之泰族，为各该省人民重要之成员。”^②

杜德曾经到过广西的邕宁县，将一个壮族村庄的壮语与标准的泰国泰语做了比较，在250个词中，相同的词有196个，占

^① [英国] H·R·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24~25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② 转引自《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78.4%，不相同的词有54个。又与云南省文山一带的壮语作比较，有2/3是相同的。由此，他把壮族视为泰族。他还说：“仲与僮同，本贵州东部泰族也，又谓广西、东京之侬人同族。”^①仲即仲家，这是过去的族称，今据其自愿改称布依族。僮即僮族，1965年改写为壮。他把我国的壮族以及布依族、黎族称为“不识文字的泰族”。东京即越南北部，这是殖民者的称呼。

泰国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即丹隆亲王）致力于泰国历史的研究，并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授泰国历史，后将他的讲稿汇集起来，以《暹罗古代史》的书名出版，因有很大影响，他便荣获“暹罗历史之父”的桂冠。他说：

“据历史所传，泰族初发源于中国之南方，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以前皆为独立国家。泰人散处各地，中国人称之为番。至于泰人放弃故土，迁徙缅甸及佬、蛮等地之原因，实由于汉族之开拓领土。”^②

英国人吴迪（W.A.R.Wood）于1926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他的专著《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他说：

“以至今日，华南人口尚昭示有泰族血统之痕迹，若云南省中人，泰族之多逾汉族。距广州市数百里内，有一纯粹泰族社区，居民所操方言，为曼谷泰人所不难了解者。”^③

德国博士克勒纳（Dr.Phil.Wilhelm Credner）于1930年率领中山大学的一个研究队到滇西考察4个半月后，发表了《南诏故都考察记》。文中说：“云南泰族并非由北面徐徐移居于云南南部地势最低的现在住所。他们乃从华南的热带低地移来，最先由粤、桂两省移至南部和西部，常居留于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热带区域。”^④这里所指当是壮族。

^① 转引自《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② 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著，王又申译：《暹罗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1。

^③ 转引自《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④ 《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82~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德国人艾思德（Egon frhr. von Eickstedt）教授于1938—1939年到泰国、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西南地区从事人类学的调查，之后写出《南亚东亚研究记游》，发表在他主编的《人类学》杂志1938年11月第8卷、1939年8月第10卷上。他说：

“在扬子江下游的湖北，我们刚刚说过的地方，当北方的古华人光顾时，无疑的早已住着泰（族）。我们从古老的言语中所知的东西很少，然而很少的一点点中却是泰或大部分是泰。”“在上缅甸、掸国、阿山（阿萨姆）、暹罗的佬与越南的佬，在广西与云南，此地今日到处都说泰语，用泰的格式建筑，照泰的习惯庆祝、游荡、恋爱。”^①

英籍学者薛登化登少校（Major Erik Seidenfaden）1941年在《暹罗境内的泰族》一文中说：“泰族乃居住华南，到了今日华南仍有数百万说泰语的人民。关于泰族的起源，一经探讨之后，已证明他们最初乃由西部，即亚洲中部和西南某中心地移来，他们在数千年前，远在佛教和基督教纪元之前，即保有中国中部，北面且达到黄河。”^②他所说的在华南说泰语的人显然是指壮族。

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一、都是外国人在做；二、是在研究泰族的起源时联系到壮族的，他们把壮族视为泰族；三、除了杜德有语言材料作为论证的依据外，其他人都只有结论，并没有论证。

二、第二阶段（1924—1948年）——国人对壮族的探讨时期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传入我国，使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出现了新面貌。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觊觎我国的边疆，我国边疆都是少数民族居住，于是唤起一些机构和爱国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的关注，开始研究民族问题。对壮族的研究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壮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

^① [德]艾思德《泰族问题》，载《西南研究》，1940（1）。

^② 《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但在民族压迫制度下，少数民族遭到歧视，有些壮人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是壮族，而称为“说汉话的土人”。因而历来对壮族的研究与对苗、瑶、彝等民族的研究相比，相对来说少一些。首先发表有关壮族的论文的是北京大学学生刘策奇写的《僮语的我见》，^① 1924年5月30日刊载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54号。刘策奇还与莫耀南、白扬煦合作，于1918—1922年，先后收集了柳州、象州等地的壮族民歌，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100多首。

明代时才出现的俍人是壮族的一个支系。钟敬文（1903—2002年，后来成为中国民俗学大师）先与刘乾初合作在1927年3月《新女性》杂志第2卷第3号上发表了《俍人情歌》，同年6月在同一刊物第2卷第6号上他自己一个人写了《俍人担歌》和《俍人扇歌》。孙中山在广州创建的中山大学于1928年1月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以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为重点。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的钟敬文撰写了《僮民考略》，1928年7月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35、36期合刊。在此之前，钟敬文与刘乾初合作用汉语翻译《粤风》中的《俍僮情歌》，1928年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刊印。

石兆棠写的《僮人调查》和《僮人的丧俗》二文，也于1928年7月同时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35、36期合刊上。另外，同年他还发表了在象州收集到的《一首很长的僮人结婚仪式歌》，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57、58期合刊。丁文江于20世纪初留学英国，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7年之久，他虽然不是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但对少数民族情有独钟，在进行地质勘查时，对少数民族也同时进行调查。他在滇、黔、桂、湘工作时，除对少数民族做了体质测量，发表论文以外，还写了《广西僮语的研究》，载《科学》杂志第14卷第1期（1929年9月）。

^① 在历史上由于封建统治者压迫、歧视少数民族，在族称旁加上犬字，僮族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改写为僮，1965年改写为壮，字音相同，字义更好。

20世纪30年代初，研究壮族的论文略微增多，有的在研究西南民族、华南民族时涉及壮族，如苗、瑶、僮一起研究，魏觉钟在《新亚细亚》杂志1931年2卷3期上发表了《广西的民族——苗瑶僮俍》。那时还没有民族识别，把僮与俍作为两个民族来论述，用现在的观点说，俍也是僮族的一个支系，并非另一个民族：那时国民党政府把居住封闭、生活极贫困、与政府和汉人交往少的民族称为“特种部族”。有的人就专门研究、论述壮族，如石兆棠继续对壮族进行研究，在《艺风月刊》2卷12期（1934年12月）发表了《柳州僮人片断的记述》。

刘锡蕃著《岭表纪蛮》一书有较大影响，时至今日，在研究壮族时还有参考价值，不少人在著书立说时还引用该书的资料，1934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再版。“岭表”即岭外，指五岭以外，也就是广东和广西。该书以广西的民族为主，旁及毗邻地区滇、黔、川、湘、粤各省以及越南、老挝、泰国有关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前著者曾任广西特种师资训练所所长，这是一所以培养苗、瑶民族师资为主的学校。他从各地来的少数民族学生中得到很多民族资料和情况。还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县任县长，从事实地调查，再广泛阅读史籍和地方志书，写成了这部专著。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使读者知道少数民族为什么落后，要“开化”少数民族，使之进步，达到民族平等。此外，“蛮民‘知识低劣’、‘习俗荒怪’、‘种族涣散’、‘生活不安定’，不是茶余酒后的谈资问题；是历代政治上弱点的大问题；是沿边国防上危险的大问题！愿国人进而讨论改善此等弱点的办法；愿国人更进而策定此等巩固边防的计划。”^①

^① 刘锡蕃：《岭表纪蛮》，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刘介（1885—1968年），字锡蕃，广西永福县百寿镇西门上屯人。1901年广西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曾先后担任三江、庆远（今宜山）、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三县县长，1934年任广西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广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建国后，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改建为广西桂岭师范学校，他任校长，历任广西省文物馆筹备处主任委员、自治区文史馆副馆长、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文化大革命”中被暴徒杀害。

他处于一种矛盾的景况，一方面同情少数民族，书中有多处正确评价少数民族之处，但另一方面又歧视少数民族，把他们称为蛮，在族称旁加上犬字边。该书以论述苗、瑶、侗、UFG 4 族为主，也旁及其他民族。内容极为广泛，有迁移历史、体质、生育、卫生、居住、饮食、服饰、婚姻、家庭、祭祀、神祇、集会、赋税、诉讼、土司、流官、刑罚、交通、农业、工商、语言文字、歌谣、音乐、娱乐、迷信、岁节、民族关系、生计，最后他以姓氏、干支、语言等十个方面论证，结论是“据著者推想，当汉蛮未曾分化以前之太古时代，原以同一种族居于中亚细亚，或其他之较近地方”。^① 这种想法当然是违背事实的。在论述壮族时，该书说“考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僮者，庆远、南丹溪峒之人呼为僮……’”^② 由于该书有较大的影响，有一些人以此转引，几乎变成事实。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撰文著书引用古籍时，不查阅原文，而是从他人的书文中转引，图方便省事，这很容易出错。范宏贵、唐兆民著文《壮族族称的缘起和演变》（载《民族研究》1980 年第 5 期）指出，《桂海虞衡志》有好几个版本：《古今逸史》本、《知不足斋》本、涵芬楼《说郛》本、《古今说部丛刊》本、《说库》本，均无刘氏上引的这段文字。后来胡起望、严沛、齐治平各出了一本《桂海虞衡志》的辑佚校注或校补，这三本都没有刘氏上举的这段话。其实刘氏上引的这段文字见于明嘉靖十年修的《广西通志》卷 53，古时无标点符号所致。后来中南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覃成号写的毕业论文也是专论此事的，说到《桂海虞衡志》一书中并无上述的那段记载。再后来广东的一位学者也写了相似的论文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黄渠在暹罗（今泰国）、云南、广西考察数年之后，在 1934 年 8 月的《复兴》月刊第二卷第 12 期上发表了《暹罗人种源出中国的考证》一文，先从暹罗人在人种上与中国南方人相似谈起，然后以衣、食、住等风俗习惯比较论证，更有力的是语言比较，说明

^① 刘锡蕃：《岭表纪蛮》，27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② 刘锡蕃：《岭表纪蛮》，1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